

农村基层志愿者成长及其思考^{*1}

赵秀玲

【摘要】：与城市志愿者研究相比，农村志愿者不受重视。而在农村志愿者研究中，外援式志愿者远比内生型志愿者来得重要。这就形成长期以来的偏向：农村志愿者研究往往多关注外部，较少涉猎真正的农村志愿者。其实，在农村基层内生型志愿者成长过程中，有不少制度探索，主要表现在草根智慧、联动机制、制度建设等方面。当然，农村基层志愿者队伍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需加大创新力度和细化优化制度，也要在确位、宣传、培训、典型化、文化发展等方面进行整体推进。

【关键词】：农村基层；志愿者；内生力；草根智慧；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C91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10-0133-06

随着我国志愿者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相关研究成果也有所增加。不过，研究者更关注城市志愿者，对农村志愿者有所忽略。即使涉及农村志愿者，也多指向来自农村外部的外援式志愿者，而对农村内部志愿者重视不够。这就造成难以避免的困局：对农村基层生长起来的志愿者研究很少，无法反映农村志愿者的实况。实际上，农村基层内生型志愿者至为重要，它既可弥补农村人才之不足，又是农村多元化治理不可或缺的参与主体，还能提升农村治理的现代化能力与水平。本文主要从农村基层内部志愿者入手，研讨其所进行的有益探索、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尚需调整和改进之处。

一、关于农村基层志愿者的制度探索

所谓农村基层，主要指县（市）级以下的层级，它是由县（县级市）、乡（镇）、村三级组成。农村基层志愿者，既包括县（县级市）以外的志愿者，即外援式志愿者，也包括县（县级市）之内的志愿者，即内生型志愿者。所谓农村基层内部志愿者，即是指由县（县级市）、乡（镇）、村产生的志愿者。与外援式志愿者相比，农村基层内部志愿者虽刚刚起步，还比较稚嫩，但进行的一些制度探索和创新颇值得称道，其成功经验很值得总结。

一是草根智慧。与城市志愿者及其来到农村基层的外援式志愿者不同，农村基层内部志愿者往往有着更多的农民智慧。在此，中国传统文化的仁者爱人、互帮互助更多一些，探索创新往往更符合农村实际情况、更接地气，其行为方式也更加灵活多样、丰富多彩。如果从全国志愿者大局看，来自农村基层内部的志愿者制度创新并不算什么，但从自发性、自主性、探索性角度看，这些创新很值得珍视。如在全国各地农村组建的老人协会，更多继承了中国古代“三老”、“五老”传统，又进行了创造性发挥，从而形成一支较为庞大、稳定、有效的农村基层内部志愿者队伍，对于农村基层稳定及善治作出了重要贡献。据统计，截至2014年，全国农村老年协会覆盖率为72.85%，而福建乡村老年协会“建会率”则在90%以上，这与该省乡村拥有传统宗祠文化与村庙文化有关。又如浙江绍兴嵊州的“村嫂”志愿者队伍建设也颇有成效。针对一些农村基层人才尤其是男性劳力的大量外流，老人、孩子、妇女成为农村基层的主体的现状，嵊州农村自发形成由妇女组织的志愿者队伍。开始是“村妇”，后来是志愿者“村嫂”，再后来是“村嫂”中加入了“小村嫂”和“大学生村嫂”；开始是一个村的“村嫂”，后来是一个镇的“村嫂”，再后来是整个嵊州的“村嫂”。这是一个善用农村基层妇女资源的成功尝试，既有助于壮大志愿者队伍，又有助于乡村治理的深化。再如，四川巴中市通江县广纳镇佛驹山村的冯霖负债50万元自办农村志愿消防队。^①本来，农村灾情多发而严重，加之地方偏僻、交通不便，单靠集体和国家的消防队难以应付，而作为农民的冯霖能自创消防志愿队，并作出较大贡

¹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科研项目“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乡村治理研究”（项目编号：YZD2011—16）

作者简介：赵秀玲，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100028。

献和产生全国性影响，这种草根智慧难能可贵。草根智慧在农村基层志愿者队伍建设中意义重大：它既是取之不尽的创造性源泉，又是提升农民志愿服务能力与水平的关键，还是克服对外援式志愿者过分依赖的有效路径。整体而言，当前广大农村基层内部志愿者的创造力并不充分，还处于初创期甚至萌芽状态，但其价值意义和引导作用不可忽视。

二是联动机制。目前，农村基层志愿者主要还是来自于国家和国外社会组织，这无疑是相当重要也是一定时期内无法改变的。这是因为要想提升农村基层志愿者现代化程度，离不开强有力的高层次外援。不过，也应该注意，国家和国外社会组织有时还难与广大农村基层对接，其间隙、漏洞甚至断裂处所在多有。比较典型的是2009年开始的江西农村外援式志愿者扶贫工作，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情况下，因外援社会组织与当地干群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难以达成共识、沟通协调，制衡作用和离心力越来越大，最终不得不从农村撤出，多年的心血转眼间付之东流。^⑧农村基层内生型志愿者有些不同，由于有着比较接近甚至共同的地域文化、价值观念及审美趣味，所以比较容易接近、交流、沟通，从而形成较为一致的文化认同。这既表现在村民之间、基层干群之间，也表现在村与村之间，还表现在村、乡（镇）、县（县级市）之间，这是有别于外援式志愿者而形成的一个有在场感的“共同体”。如原来一盘散沙的村民很难得以凝聚，有的甚至不顾公共环境卫生随意堆放杂物、抛弃垃圾，然而在志愿者引领下，破坏环境的村民不但清理了杂物、改掉了随意倒放垃圾的习惯，有的还加入了志愿者行列。这是村民志愿者协同一致的巨大磁力，也是农村基层内部志愿者由无到有、由少到多、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广东惠州成立农村志愿者服务站，村支书任站长。浙江海宁祝东村在志愿者服务时，实行“五队联动”，这五队分别是镇村考评队、村卫生保洁队、监督巡逻队、红链志愿队、文明宣传队。2014年2月，山东荣成前荫子芥社区志愿服务队成立，前荫子芥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姚洪波任队长。在他的带领下，2016年这支队伍发展到200多人，最小年龄为20多岁，最大年龄80多岁，有的一家3口都是志愿者。吉林长春榆树市弓棚镇成立志愿者联合会，会长由镇党委副书记孙国珍担任，镇党委宣传委员担任副会长，成员由镇团委、妇联及各村团委书记组成，各村、机关成立联合分会，下设五个服务小组，这是乡镇与村的协同发展。浙江温岭市的慈善义工协会，也实行县、乡镇、村志愿者义工协同联动发展，效果十分显著。浙江平湖市新仓镇结合实际，建立“团、营、连、队”四级军事化志愿者管理模式：在镇级成立镇志愿服务团指挥部；村级成立志愿服务营、连、队，营长由村支书担任，连长由党员先锋站站长、老干部、村民组长等村新乡贤担任，队长由热心公益的村民担任。为保证志愿服务的组织力量，各村还将民营企业负责人、专业大户、农村经纪人、村庄技术能手等纳入其中。这样，新仓镇共建立1个志愿服务团、9个志愿服务营、60个志愿服务连、165支志愿服务队，约有4000多名志愿者，带领群众投身各类“微志愿”活动。这一制度模式有效搭建了志愿者、服务对象和服务项目的有效对接平台，激活了镇、村、组、户志愿服务管理的神经末梢，是农村基层内部志愿者联动机制的典型代表。^⑨总之，农村基层内部志愿者队伍建设，有利于充分利用各种优势，发挥合力作用，以达到制度优化，这是一条最为可靠有效的成功经验。

实现这一联动协同发展目标，有以下主要因素在起作用：第一，党的领导核心是关键，农村基层党员争做志愿者，示范作用特别突出。第二，互联网信息平台是有效技术手段，它使原来难以逾越的农村基层时空变得瞬息即可到达。第三，职能部门容易沟通交流，保证效率最大化。第四，文化志愿者具有纽带和长远发展作用，一根文化丝带往往直接将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县乡与村庄紧密相连。

三是建立制度机制。制度化往往是衡量一个组织及其行为是否成型乃至成熟的标志。与外援式志愿者具有严密的制度不同，农村基层内部志愿者多是随意的、自发的、简单化的，缺乏必要的制度安排，即使有往往也难以达到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但也有一些例外，它们在制度化上达到了一定的创新程度，从而改变了农村基层内部志愿者的整体结构。如绍兴县依托19个镇（街道）党员服务中心和121个村（社区）学员服务站（室），立足于本地实际和群众需求，开展志愿者“六式服务”，包括：组团式、菜单式、管家式、一站式、结对式、预约式，形成了优质、高效和全方位服务的制度化机制。山东泰安新泰市的“平安协会”在农村基层内部志愿者制度建设方面更有代表性。这是一个由党委、政府领导，群众自愿参与，尤其是“三老”（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作为主力军，民政部门批准的群众自治组织。目前，全市20个乡镇（街道）都建立了平安协会，602个村（社区）组建了平安协会分会，形成市、镇、村、行业四级网络组织体系。另外，除了协会章程等各种制度规定，新泰平安协会建设还有以下特点：第一，坚持党的领导与群众民主参与相结合；第二，坚持综治与自治力量相结合；第三，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第四，坚持群众共建与共享相结合。在这样的制度化建设中，农村基层内部志愿者得以健康成长，尤其是将志

愿者与乡村治理紧密联系起来，使其发挥更大作用。^④因此，在目前农村基层内部志愿者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绍兴县的“六式服务”和新泰市的“平安协会”就具有典型的借鉴意义。

值得强调的是，从更大的文化背景看，农村基层内部志愿者制度创新离不开中国传统互助文化与西方志愿精神的双重影响，也离不开传统传播方式与现代传媒的双向互动制约，更离不开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协同参与。因此，目前的农村基层内部志愿者制度创新既具有本土性又具有现代性，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与路径，这对于过分强调和依赖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社会组织也有一定的纠偏作用。

二、农村基层志愿者局限分析

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应对当前农村基层志愿者队伍建设予以充分肯定，但与城市志愿者尤其是发达国家志愿者相比，当前农村基层志愿者还有较大差距，也存在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农村基层内生型志愿者队伍建设非常薄弱，需加快推进和全力展开。尽管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志愿者队伍建设获得了长足发展，但与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差距却相当大。据统计，2013年，世界各国志愿者平均参与率为10%，发达国家为30%—40%，而我国城市志愿者占3%，农村志愿者不到1%。到2015年，美国、德国、英国志愿者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分别是82%、68%、53%，而我国则不到5%。^⑤在民政部印发的《中国社会服务志愿者队伍建设指导纲要（2013—2020年）》中，明确提出“力争到2020年，注册社会服务志愿者占居民总数的比例达到10%”。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农村基层志愿者远不能与城市志愿者相提并论，所占比重更低。还有，即使在农村基层志愿者中，也多是来自城市的外援式自愿者，真正从农村基层生长起来的志愿者更加微弱。再进而言之，即使在农村基层内部的志愿者，也存在这样的困局：其主体来自县、乡，而土生土长的村庄志愿者更加势单力薄。这是一个由高到低不断减弱的志愿者占比序列，呈现出中国广大农村基层最真实的志愿者缺乏现状。这里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方面，有的农村基层志愿者队伍得以壮大，如浙江仙居县有100个行政村建起万人志愿者队伍，黑龙江有2万名农村文化志愿者在9011个行政村几乎实现了全覆盖。^⑥另一方面，这些数量庞大的志愿者不要说多来自农村基层之外，即使是农村基层内部的志愿者也有不少来自县、乡两级。这就大大降低了村庄内部志愿者的数量和比例。面对众多村庄，有限的志愿者占比就更加低了，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县的志愿者确立这样的奋斗目标：突破零次进村服务的困局。可以说，面对汪洋大海般的中国村庄，再多志愿者也难满足其巨大需求。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两个目标：一是动员更多的外援式志愿者进村服务，二是加大力度和加快速度培育农村基层内部尤其是村级志愿者。

其次，农村基层内部志愿者制度创新不足，直接影响志愿者队伍建设与乡村治理的层次与水平。就目前情况看，我们虽注意到一些地方开展了农村基层内部志愿者制度创新，但整体而言，这样的案例并不多见，也未达到应有的层次与高度。更多的则是缺乏制度创新性，甚至没有具体的制度规定。不少县乡虽制定了相关规定，但是类同化、模式化、机械化倾向相当明显。就县、乡、村内部的志愿者而言，其服务的对象、内容、方式、方法也往往大同小异，有对理念和路径过度依赖之感。一般说来，志愿者服务的内容和形式可以相同或相似，这有时也是必须的，但如果一直缺乏新意，比较老套和随意，无多元化、个性化、趣味性的创新探求，那就需要加以注意了。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创新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⑦如从这一高度来审视农村基层内部志愿者制度建设及其服务工作，创新维度还未真正形成，更缺乏理性自觉意识和贯彻落实措施。

再次，相关制度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具体性和可操作性。目前，农村基层内部志愿者制度建设有三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是过于依赖国家关于志愿者的相关规定，自主创新意识不强。二是制度创新力度不大，导致有关规定比较笼统，缺乏系统性、准确性和可操作性。三是许多制度普遍性有之，但不能贴近农村基层实际，尤其是难以体现每个县、乡、村的具体特点。这就造成农村基层内部志愿者实践缺乏具体、可行、有效的规定作为指导，具有相当的随意性、盲目性、滞后性。没有创新作为内驱力，就不能充分调动农民智慧；离开农村现实的具体场景，照本宣科、邯郸学步般固守条条框框，势必会失去活力。对于西

方理论与社会组织的有关规定，我们只能将之作为一个参照，而不能生搬硬套，更不能视之为正确模板和终极目标，否则就会不接地气，甚至出现南辕北辙的情况。对于国家及地方政府的有关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要不断丰富和发展，否则就会陷入误读和误解状态。如现在不少农村基层内部志愿者往往不加思考，盲目跟从文化服务的倡导，由于没有具体抓手，对“文化”的理解还停留在“知识”层面，所以导致“文化”的泛化甚至异化。一般来说志愿者为村庄送来“知识”、带领村民唱歌跳舞，这固然是一种志愿文化服务，但像汝城县那样用快板《环境卫生我来说》、三句半《农村环境整治大会战》来推动农村文化发展，就将文化服务提升了一个层次。如能摆脱直接说教，而是寓教于乐，让广大农村干群得到志愿精神的熏染和提升，就更能体现“文化志愿者”的身份与内涵。还有，关于志愿者的加入门槛、奖罚制度的规定往往都付阙如，这直接影响了制度的科学性、可行性、有效性。广东清新县的“社工+志愿者”和福建南安县的“共青团+社工+志愿者”农村公共服务模式，就提高了志愿者的门槛，即通过面试、审核与技能把关，更强调专业和精准服务。北京延庆区制定《“1+1”关爱空巢老人服务志愿者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服务协议》，投入2.5万元为农村助老志愿者购买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250名农村助老志愿者从此有了“护身符”。^⑥浙江宁波北仑区以“积分制”激发农村党员积极性，每个农村党员志愿者都有一张积分卡，作为考核依据，积分多的还有奖励，不足的则会影响党员年底考评。在浙江仙居，敬老、养老、助老被写进村规民约，干部选拔、村民入党、村福利享受、宅基地审批，都与慈孝挂钩，孝德不过关者一票否决。显然，制度规定如能朝着更加具体、细化的方向发展，农村基层志愿者队伍建设就会更加规范化，其质量和水平也会大为提高。

农村基层内部志愿者有其独特优势，这是其能不断开拓发展的关键，也是未来更上一层楼的前提基础。不过，站在世界志愿者的发展高度，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目前我国农村基层内部志愿者队伍建设还处于草创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既包括具体的技术层面，也包括制度机制建设，还包括思想理念与精神诉求等。对此我们必须保持客观、清醒和理性的认识。

三、农村基层志愿者队伍建设瞻望

要突破现有困局，农村基层内部志愿者队伍建设必须有所推进，在理念和方法上实现真正的超越。这既需要有全局眼光和整体思维，以纵览世界和国家发展大势，也离不开农村本位和底层思维，从实际和细部反观农村基层志愿者发展。只有这样，才不会陷入空泛与盲目的双重误区。

第一，充分利用各种传播工具，大力推进志愿者尤其是农村基层志愿者队伍建设。各级政府应将国家及各国有关志愿者的制度和精神，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农村广大干群进行阐释。在农村基层应力避高头讲章的传达方式，而要以农民看得懂、听得明白的方式进行普及。这就牵扯到宣传和传达方式的变革问题。在这方面，一些基层政府利用发放小册子、展展板、拉横幅、建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宣传志愿行动，其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来说，传播志愿者精神更是大有可为。因为以网络微信为平台的传播方式，人多、面广、快捷、方便、有效，作用相当大。同时，应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在传播中的主体功能作用，因为对于受众尤其是农村基层干群来说，这些传统媒体的影响力仍是主要的。然而，以央视和各省电视台为例，各式各样的娱乐节目应接不暇，但没一档是关于志愿者的节目，至少有对于志愿者的报道和宣传。未来应通过电视等传统大众传媒传播志愿者的正能量，尤其应将触角伸向农村基层。对此，除了国家和省市台外，各县电视台应发挥更大作用。

第二，在全国尤其是贴近农村基层树立典型示范，将那些真正的志愿者模范集体和个人推举出来，形成全社会尊重、热爱、崇尚志愿者的文化氛围。以雷锋、白求恩为例，他们是那个时代志愿者的典范，为此，毛泽东曾题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纪念白求恩”，高度评价和赞扬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也是志愿精神）。目前，之所以广大农村基层开始形成一些地方争做志愿者的局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干群做志愿者不仅获得了尊重和荣誉，也是自我实现和提升的一次质的飞跃。江苏徐州梁寨镇渊子湖北岸有片树林，由于每棵树都是干群自发捐助的，所以被称为“百姓林”。为表彰人民群众的奉献精神，镇政府在4000多棵树上都挂着小牌子，上面写着该树的品种、捐赠人及捐赠时间。当问到捐赠一事时，志愿者表示与镇领导积极带头有关。领导争做志愿者，遇到困难户主动捐款捐物，像镇党委书记王磊、干部张焰就是如此。有领导带头，村民做志愿者自然就心服口服。广东阳山县委办秘书李可乐，利用节假日带领团队组织开展活动200多场，助人5000人次，他本人累计服务时间2000多小时。他还成为网络推手，将微信经营成微公益平台，广泛宣传志愿精神，广集志愿者和汇聚爱心。因表现突出，他被

授予阳山县优秀志愿者、道德模范称号，又被评为清远好人和广东省五星级志愿者，2016 年还被授予广东省岗位学雷锋标兵。这些典型人物和事件虽在某些报刊上有所宣传，但力度还远远不够，应充分利用农村基层熟人社会的荣誉感和自豪感，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进行传播，使其成为全社会的典范。

第三，加强文化传播广度、力度和深度，使志愿者的成长富于内生力。因为文化作为国家发展的软实力，有时比政治、经济的影响力更内在和长远，在农村基层志愿者培育过程中也应注重“文化维度”。虽然当前党和国家提出了“文化志愿者”的发展构想，但在广度、力度和深度上还有待提升。在此，需要从深层次理解“文化志愿者”工作。当前，人们更多将“文化志愿者”工作理解成为做文化之事，如传播知识、组织文艺活动、开设农村书屋，但相对忽略培育文化之人，即从心理、道德、精神、审美等角度提升人的能力和水平。这就带来对于文化的表面化理解，也会影响文化志愿者的层次，进而限制农村基层善治。冯骥才表示：文化眼光不是一般的眼光，它必须具有文化意识和文化素养。有些事物的历史文化价值，必须站在未来才能看到。文化，不仅是站在现在看未来，更重要的是站在明天看现在。那么，文化眼光不只是表现为一种文化修养，一种文化意识，更是一种文化远见和历史远见。^⑤ 以这样的文化眼光来培育农村基层内部志愿者队伍，可谓任重道远，但却是正确的方向。

第四，进一步完善志愿者相关法律法规，为农村志愿者确权，使之与其它基层治理主体建立良性互动关系。目前，作为多元治理的主体之一，农村基层志愿者尽管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角色内涵与边界并不明晰，有时甚至呈现重叠、游离以及混乱状态。换言之，在农村基层治理中，志愿者与党支部、村委会以及其它社会组织如何划界，以确立自己的独特性，这是需要探讨的。如老年协会、理事会一面是一级村民自治组织，一面又有志愿者性质，二者如何协调发展？让乡村干部成为志愿者，其两个角色怎样体现，边界区分何在？如果说精准扶贫本身就是乡镇干部的职责，那么又怎样体现其作为志愿者的责任和义务？换言之，当乡镇干部成为志愿者时，他就同时在乡镇组织和社会组织中具有了双重身份，其职、责、权、利等是需要明确和划分的。还有，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曾指出：“志愿精神的核心是服务、团结的理想和共同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信念。”^⑥ 那么，农村基层志愿者承担的主要是服务功能，他是否也应参与乡村治理的协商、决策与监督？这也是我们需要进行深入研讨的。以山东邹城为例，2013 年 3 月邹城开通“志愿服务网上直通车”网上信息平台，这种以驻村第一书记为信息员的运行模式在省内外尚属首家。驻村第一书记担任志愿服务需求信息员，通过网上发帖及时将村里需要服务和帮助的信息传递到信息平台，以便于更好地吸引帮扶者。这样，农村志愿服务网上平台的救助项目，从原来单一的农村扶老助困、助学助残，拓展到乡村文明创建、农业服务、乡村法律援助等十几个领域。^⑦ 这就给我们带来一个疑问：作为驻村第一书记，他如果不是志愿者，这些工作是否属于其职责范围？那么又如何区分两个角色身份在他身上的叠加？因此，今后相关法律法规需要对志愿者进行确权，否则就会出现混乱甚至越俎代庖的情况。

第五，高度重视培训工作，全面提升农村基层志愿者队伍现代服务能力。从结构来说，农村基层内生型志愿者知识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科学发展理念不强，现代思想意识也亟待提高。不论是老人协会，还是村嫂，抑或是红娘等，都是如此。因为世界发展日新月异，农村老人、村嫂和红娘的知识结构、思想观念与能力水平很难适应新形势，这就需要补课甚至亟待恶补。解决这一问题，有几种途径：一是要组织农村基层内部志愿者读书、学习，掌握更多文化知识，以便更好地为群众服务。建议充分利用农村书屋、文化礼堂和乡贤传授，全面提高村民文化知识水平。二是请进来，让更高层次的专家学者尤其是高层次志愿者为农村基层内部志愿者授课，以提升其思想理论和现代科学管理水平。这是一项转变思想观念与方式方法的希望工程，应在城市反哺农村中实现这一重要目标，尤其要注重邀请本土在外乡贤回到乡村为志愿者授课。三是充分调动农村基层内部各行各业的专家为志愿者授课，这既包括县、乡层级，又可使村庄贤能者积极参与，在与志愿者的互动中达到双赢效果。低水平的农村基层内部志愿者可全方位受益，高水平者也会获得荣誉感、通过回报家乡得到自我价值实现，而在这一过程中又无形地净化了农村基层社会风气，积蓄和张扬了正能量。四是有条件的应创办专门的志愿者培训学校，形成县、乡、村不同层级的联动体系。一般人总认为，办学应是省市甚至国家的事情，其实在农村基层应根据自身特点优势创办各类培训学校，县乡两级在此大有可为，村级也可自办夜校、冬校。要提倡在农村基层创办属于自愿者的学校，通过这种办学方式，既可充分调动农村广大基层干群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可根据实际情况培育适合农村基层的志愿者，还可使志愿者服务农村基层进入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轨道。山东潍坊市诸城“农村社区学院”就是一个典型范例：它成立于 2009 年，有不少专家到学院为农村学员义务授课。如畜牧兽医专家孙洪山几个月内连续举办培训班 180 多期，培训学员 5000 多人。在培训期间，他还走遍 108 个农村社区，为

养殖户答疑解惑。虽没有一分钱的培训费，但孙洪山由衷感到幸福，他说：“养殖户对畜牧科技的热情，就是给我的最好报酬。”马志芹退休前在乡镇党委工作，退休后她积极投身志愿服务，靠一手剪纸绝活为诸城农村社区学院办培训班，几个月共培训 4000 多人。由于农村基层市场需求巨大，马志芹不断地“赶场”，有时一天要赶 200 公里。对此，她调侃自己说：“一辈子没出名，想不到退休后反成了明星，到处‘赶场’。”^⑩由此可见，农村基层志愿者培训市场的空间巨大，也颇具魅力和吸引力。当然，农村基层志愿者的培育方案还不止于此，还有一些方式值得探索。如充分调动学生、家长和学校在志愿者培育中的重要性：可通过吸收和培训农村中小学生做志愿者，影响其家长。反过来，亦可通过发展家长志愿者，为学校捐资捐物和提供服务。与此同时，学校也可承担培训学生家长志愿者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一个多方参与、协同作用、共赢发展的新思路。

总之，农村基层志愿者队伍建设虽刚刚开始，但潜力巨大，未来发展空间值得期待。问题的关键是观念要正确、方法需得当、路径有依靠。需要强调的是，在向西方文化与西方社会组织学习时，要依托中国农村基层实际，尤其需要结合中国互助友爱的文化传统，对其进行现代性转换和再造。这是一个需要多方参与、充分发挥各自特性和主体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开展更多探索与大胆创新。

注释：

① 谢颖：《负债 50 多万元“冯傻儿”组建农村志愿消防队》，《华西都市报》2015 年 8 月 24 日。

② 参见贾西津主编：《中国公民参与：案例与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6—67 页。

③ 《平湖：“爱心订制”激活农村志愿服务》，《嘉兴日报》2015 年 7 月 16 日。

④ 参见韩旭：《新泰市“平安机制”建构与社会治理法治化》，赵秀玲主编：《中国基层治理发展报告（2016）》，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71—385 页。

⑤ 韩利诚：《有待开发的人力资源——美术馆的志愿者》，《美术报》2015 年 8 月 15 日。

⑥ 李鹤琳等：《仙居万名志愿者集体行孝农村空巢老人有了“家”》，《浙江日报》2013 年 12 月 16 日；张建友：《在基层文艺舞台上翩翩起舞——记黑龙江省农村文化志愿者》，《中国文化报》2016 年 7 月 18 日。

⑦ 李贞整理：《习近平谈创新》，《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 年 3 月 1 日。

⑧ 夏开晗等：《延庆助老志愿者有了护身符》，《京郊日报》2017 年 2 月 16 日。

⑨ 冯骥才：《文化眼光》，《中国当代才子书·冯骥才卷》，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29—233 页。

⑩ 参见张勤：《志愿者培育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0 页。

⑪ 张超等：《邹城建成农村志愿者服务网上平台》，《农村大众》2014 年 11 月 12 日。

⑫ 赵秋丽、孟飞：《农村来了志愿者》，《光明日报》2010 年 6 月 9 日。